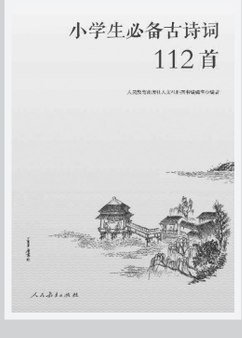
编者按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年。70周年风雨历程，人教社推出了无数惠及万千学子的优质出版物，而这背后更是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教人的心血和付出。近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编客”特设“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庆70周年专版”，我们很荣幸邀约到若干人教社资深编辑老师的投稿，讲述他们在策划、编辑加工、与作者交往、装帧设计、数字化转型等过程中发生的，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特殊意义的事件、见闻和感悟，以此记录书与人的故事，为人教社70周年献礼。这个栏目将分四期推出，敬请期待。



葛 欣

施 歌

黄攀伟

在人教社百炼成钢的那些编辑（一）

历练对于读者适切性的把握

■张华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主任）

关于古诗词导读的选题，我琢磨了很多年，还在教材编辑室做编辑的时候，就想过学生们需要这样的书。市场上有很多同类题材的书，那些书各有各的优点，但问题也很突出，有的一看就是纯粹学者写的，学术味儿太浓，端着架子，用了深奥的学术用语，对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并不太适合。有的通俗倒是通俗，但很多知识未经仔细核校，以讹传讹，给了读者错误的信息。还有的书，封面上说是配套教材，但其实跟教材无关。我们社从1950年建社之初，主体业务就是教材编写、出版和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对于学生的学情，学习的需求点，教材的组织架构等方面比较熟悉，我们来做这个配合教材的传统文化的系列，有优势和基础。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启动这个项目，已是几年后。社里把我从教材编辑室调入新成立的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开始策划、编写这个项目。我们的团队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初稿撰写，改稿和编辑出版又用了半年时间。《小学生必备古诗词112首》销售时，虽然赶上新冠疫情，但却并未影响读者购买该书的热情。京东包销2万册，此后对外又加印5万册。最关键的是读者对于该书的读后反馈——觉得导读文字优美，知识点难度恰当。很多家长追问，初中本什么时候能出版。策划、编写这本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也有些体验和感受。

发挥人教社优势，传承优秀编写经验。人教社的优势是教材编写和出版，课程、教材、教学研究，长期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编写经验，其中一条是编写团队最好是上中下三结合，上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中是我们编辑，下是一线优秀教师。专家、教授能把握学术前沿的准确信息，为学习方向和高度把关；编辑负责上和下之间沟通和融合，了解表达中深入浅出的重要性；教师了解课堂、学生，了解考核需求，更能抓到痛点和难点。

文章不厌千遍改，一字一句见真功。得益于优秀的编写团队和审读专家支持，我们的书稿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初稿基础。但即使如此，稿子也是经过编辑和主编十几次的编辑、核校、润色，每个月我们都会开一次统稿会，会上把对每首诗的导读一字一句地讨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人教社建社之初社长叶圣陶先生奠定的教材统稿方式，就是一字一句地读，一字一句地讨论，经过这样的讨论和修改，一般来说，后期才有可能经得起上万读者的检验。讨论会上，大家会争到红脸，为了某个字词的注释，究竟是这样对，还是那样好，过后又会哈哈一笑，君子之风，徐徐而来。

关注学情最重要，心怀读者见始终。编写、出版这样一本古诗词方面的书籍，比起学术功底，我们不如中华书局等专业出版古籍图书的社；比起创意，我们可能不如中少等擅长儿童类图书设计的出版社；比起商业运作，我们可能比不上很多长期从事一般图书销售的出版社。那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胜出的可能性在哪里？优势是我们对于学生的了解，胜出的可能性在于我们要始终坚持这是为小学生编写的一本书，要从各个角度、细节考虑小学生的阅读情况和需要。

我曾作为教授在大学讲台上教过书，进入人教社后就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工作，长期研究语文教学，每年都会到全国各地的一线课堂听课，发达地区特级教师的课，西部地区的课，常态课，老师像“打了鸡血”满堂灌的课，我都听过。因为有教师、编辑、教材编写者、教学研究者这样一些角色的亲历，比较了解讲授和学习的难点，对于学生和读本之间的适切度，有深刻的体会和想法。作为策划和主编，我最关注和强调的，就是对读者的适切性的把握。比如对于诗人的注释，关于诗人的信息有很多，究竟我们需要给出哪些，而不必给出哪些，这是需要严格把关和筛选的，如叶圣陶先生说的“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我们要做的必须给与读者需要和必要的知识，而不是随便堆堆儿。

踏破铁鞋觅群书，偶见庐山真面目。编辑埋头编辑、完善别人写的书，这些书各种各样，什么内容都有，想做个更好的编辑，就不能停止读书、学习。我曾经犯过一个知识性差错，就是作者在行文中有一句“包括鲸等鱼类”，我没看出有问题，后面被审读查出，才确认鲸不是鱼类。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内陆生活、没接触过海洋的人，“鲸”字又带着“鱼”字旁，这样的错误很正常，但对编辑来说，这就是知识储存不够，或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度。有一天，我看到丰子恺的女儿回忆丰子恺的文章，其中提到丰子恺有一幅画是画了一幅新月，但月亮的形状画错了，不是新月。这就是文艺创作和科普的差异性，对于大画家、文学家等大艺术家，有时我们会选择欣赏艺术美，而不太计较其中的准确性。但我想起了《小学生必备古诗词112首》中的插图，每首诗我们请画家用中国传统线描法画了插图，插图中也有一些与诗词不符合的地方，之前我们已检查出一些。有没有画错了的月亮呢，因为古诗中还是有很多处提及月亮。提醒编辑去检查，果然在白居易写的《暮江吟》中，插图中的月亮画错了。“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里初三夜的月亮正是新月，画家初稿画成了相反方向，是残月了。

编书过程中有很多辛苦、委屈，编辑在书稿上倾注了很多心血，而读者看到产品中的一两处瑕疵，会提出很多批评。不过编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欢乐，如上面说的，我们能跟着专家、学者，跟着老师、优秀的撰稿人，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们在讨论中，能感受到纯粹的学习的快乐。

亲历数字出版的焦虑与变化

■葛 欣（人教数字公司移动学习事业部总经理）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也正好是我从事纸质出版的7年和数字出版7年的汇合点，我叫它事业的七七相会之年。这14年里，我经历了图书出版的兴盛期、衰减期和数字出版的萌芽期及快速发展期，我亲历了纸质出版在时代变革期的焦虑与变化，也体验了出版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开拓探索期的激动与挣扎。

出版的转型与融合发展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2013年，我调入人教数字出版公司。人教口语APP是我策划的第一款产品，它也是公司里最早集成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我特别主张运用技术工具去提升学生“测、练、评”的效果，通过技术让内容有更好的表现形式和更佳的效果，所以早在2014年产品一上线就具有了语音评测功能。当时技术很新，还不那么成熟，内容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困难很多。

举个例子，我们最初集成的是科大讯飞离线评测的版本，项目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开发是外包团队。评测引擎集成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和开发团队及引擎支持团队三方多轮远程调试与修改，总是不尽人意，之后我请引擎支持团队来京一起现场调试。那天到晚上11点多，当我走出开发团队公司的办公大楼，灯光昏暗，原本有些路盲的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当年导航软件还没怎么出现，我也不好意思让我叫来加班工作的团队送我，自己壮着胆子摸索着找路，走了很久才走到大路上，看到了公交车站。回家后再继续进行产品的测试和验证。

当年产品中几千条句子，测试是我自己来做，一句一句地测，测完苹果系统，测安卓，系统不同，引擎是不同的，一处标点，一个英文全角半角都能引发无法评测的问题，引擎对接修改后，几千个句子，两个系统再重新测试。因为一旦修改，可能会引发程序其他问题，所以就要再全测一遍。每次发现问题，我都恨不能把手机摔个稀巴烂。**产品的创新似乎都是经历了惨烈的磨炼，痛苦的煎熬，才有了产品的新生。**

当年为了产品能更加精准地表达英语教学的最新理念，我多次请教社里专家，哪怕是在午餐时的社里食堂，只要看到编辑老师们，我就一直不停地追问教材与教学的各种问题。像英语编辑室的张献臣老师，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从教材编写研发理念，到某一个具体主题的设计思路，把我的疑问回复得清晰透彻，特别耐心，让我感动。我参加人教社举办的中青年论文大赛，积极分享产品研发理念及技术融合的理念，希望得到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埋点采集学生各种学习数据，然后对数据结果进行各种分析对比，不断优化迭代功能，让产品不但要更加好用，还要更加有效。我参加说课比赛，在讲述教学过程与答辩中，积极和专家切磋教与学的产品应用场景，努力去提升产品的适用性与实用性。我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去与专家探讨，去倾听专家的意见反馈。后来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人教口语APP先后获得了国家多项大奖，“全国十佳出版新技术应用奖”、全国“数字媒体创意”大赛优秀奖、新闻出版互联网 “知识服务创新项目奖”、“2018年最受欢迎的英语教育产品”、获得2018年人民日报的实名点赞等等。

除人教口语外，我和团队还研发了人教点读产品，几年下来，人教点读APP已从最初的只具备点读功能的数字教材扩充到有主学科教材、学科工具以及课程的系统学习产品。产品创新中处处都是困难，创新者的窘境于我来讲体味地淋漓尽致，但也练就了我百折不屈的工作状态。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期间，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号召，人教点读APP从大年初五开始就对全国用户免费开放，整个团队连续几个月高强度作战，顺利保障了全国1300多万用户的在线学习服务，服务器访问量累计超过了62亿次，受到了中央及地方多家媒体的报道。

数字出版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与图书出版线性化的工作不同，用户的需求把握程度、内容的品质、技术的开发效率，交互的体验、运营推广的策略等等，方方面面深度地耦合在一起，任何一方面弱一点或者慢一点，都将对全局的成败有着致命的影响；除此以外，产品研发还需要一种精神，就是团队勇于扎到一个又一个枯燥的细节之后，仍然还能有着底层的热情和内在的驱动力。

词典里的“万花筒”与“吃回头草”

■黄攀伟（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高级编辑）

2020年夏天，《新编学生词典》的编写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这本专为广大中小学生编写的词典，既要收录现代汉语常见常用词语，满足学生查检和学习的需要，又要配合部编本语文教材，给语文教学提供参考依据。为此，人教社辞书室与北大中文系现汉、古汉教研室的老师们结为合作伙伴，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工”，几次召开线上会议都无一缺席、一口气讨论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大到框架结构、全书体例，小到某个词的词类划分、某个义项的释义用语、某种体例的特殊符号。

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我整理完手上的稿子正准备洗漱，突然收到编辑室主任谢仁友老师发在群里的一条微信：“刚刚项梦冰老师告诉我，为了使他撰写的‘万花筒’条更准确，他专门从淘宝买了新式旧式万花筒各两种，发现确有区别，这个不同现有词典都没有说过。他明天会将该词条改后的新稿发给我。”我本科时就上过项老师的课，后来又跟随方言学的老师到福建田调。项老师做学问的严谨，我早有体会。但万花筒真的有两种吗？又有什么区别呢？原来，原词条在释义中写道：“（万花筒是）一种圆筒形光学玩具。从圆筒顶端的观察孔往里看，可以看到对称性的像美丽花朵一样的图案……这些图案是通过筒身内安装的三棱镜对用一片毛玻璃和一片透明玻璃夹在圆筒底端的彩色纸屑或彩色碎玻璃等的反射而形成的。”这个释义没有错，但是项老师发现，除了这种传统的“内景万花筒”，还有一种新式万花筒，它使用的不是三棱镜和玻璃，而是水晶球或凸透镜，反射源也不是内部的彩色纸屑或碎玻璃，而是外部世界的万事万物，因此被称为“外景万花筒”。这样，词典原来的释义就显得不够全面，而且其他词典中，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看到项老师的修改，我不禁心生敬佩，既感动，又感慨。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我给北大中文系的郭锐老师送资料。虽然这些资料与《词典》无关，但简短的交接之后，郭老师果然话锋一转：“攀伟啊，我觉得《词典》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啊！”我立刻紧张起来，掏出手机准备记录。“比如，‘吃回头草’这个词条说‘比喻走回头路。也特指女子改嫁’。用‘走回头路’来解释‘吃回头草’是不准确的，这是两回事，我们说‘坚持革命道路，不走回头路’，不能说‘不吃回头草’啊！‘特指女子改嫁’也不对，可以说成是‘指在恋爱或婚姻中与分手的前任复合’。”郭老师提到的这个词条恰巧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我赶紧向郭老师解释这个词条已经修改过来，请他放心，并且把郭老师提到的其他问题、参考资料逐一记下来，准备回到社里跟老师们进一步查阅资料、研究论证。那时北京刚刚入秋，艳阳高照又凉风习习，我的心情与体感出奇地一致，既因为与崇拜的老师交谈而感到无比温暖愉悦，又因为心怀敬畏而微微紧张颤抖。我和老师坐在公园长椅上，畅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从《词典》中的具体问题，到如何做一个好编辑，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高品质的辞书依赖高水平的编写团队。“万花筒”“吃回头草”……这些看似简单、普通、平常的词条背后，是顶尖学者的思考和研究，目的是把准确、权威的释义呈现给读者。第一本现代英语词典《英语大辞典》的主编塞缪尔·约翰逊曾说：“如果你要痛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里包含了所有的痛苦与折磨。”**编写一部优秀的词典确实很辛苦，但此中获得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可以使一切苦尽。更令人着迷的是，自己最崇敬的老师的指导、鼓励和认可可以使一切甘来。**我一直倍感幸运，因为从事着与专业相关度极高的工作，所以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师们的关怀与监督，既有所依赖，又不敢懈怠，如谢仁友老师所说：“真知来源于实践和生活。辞书编撰亦然。老一辈学者的问学与工作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我的塔吉克斯坦帅翻译穆志龙

■施 歌（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

如果不是编辑业务的缘故认识了穆志龙，可能塔吉克斯坦这个国家于我而言，永远只是“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普通地名。但现在有了我的塔吉克斯坦帅翻译，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和他相识于《跟我学汉语》多语种项目。这是一套孔子学院总部研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针对海外青少年的国际中文教材。我们汉语编辑室的几位责任编辑要基于英语版教材，联系20多个语种的译者，对原书做国别化、适应性的改编和翻译。机缘巧合，塔吉克语版的光荣任务落在了我头上。

以往我负责过葡萄牙语、土库曼语等语种，大都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外孔子学院等机构聘请专家，但这次却让我犯了难。因为国内的高校基本上没有开设塔吉克语专业，这样的汉语教材在国际中文教育史上也几乎是空白。几经辗转，颇费周章，我终于联系到了新疆一位塔吉克族教授，他却说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和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族同胞的语言不太一样，最好还是找一位本国的译者，于是把穆志龙推荐给我。穆志龙是这个小伙子的中文名字，他本名是阿穆尔丁·诺斯洛夫（Amriddin Nosirov），出生于塔吉克斯坦库洛布，与新疆只有一山之隔。2009年他考取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新疆师范大学学习商务汉语。2012年起担任《大陆桥》杂志的塔文翻译。2013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深造，攻读外交学专业的硕士。2017年初我认识他时，他在上海经合组织工作，不久成为塔吉克斯坦驻华使馆的一员，妥妥一枚帅气的外交官。

记得那是2017年的春天，我跟穆志龙简单电话沟通后，约好在使馆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笔挺的西服从工作岗位步行10分钟翩翩而至，我连忙站起身来，回应以职业性、礼貌性的标准微笑。他对这个项目比较认可，觉得是为那些想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塔吉克斯坦青少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愉快的交谈和短暂的会面后，说好了编译要求、交稿时间和注意事项。

那套书有8本需要编译，工作量很大。接下来的2年里，我们频频在微信和邮件里沟通一些细节问题。穆志龙会经常问一些让我这个对外汉语专业的老编辑瞠目结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黄瓜明明是绿色的，却叫做黄瓜？为什么喝酒的是夜店，过夜的叫酒店？为什么站在电梯里，却要说坐电梯？……呃，好吧，看来我还需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018年3月21日，是塔吉克斯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诺鲁孜节。穆志龙邀请我到使馆参加庆祝活动，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我观看了载歌载舞的演出，品尝了当地美食，欣赏了精美的油画和服饰展览。我第一次面对面直接感知塔吉克斯坦文化，深深地为自己的工作能促进两国友谊而自豪。

后来的两年，我见证了穆志龙在北京娶妻生子，和他美丽的妻子——塔吉克斯坦漂亮姑娘李好也成了好朋友。我还有幸受邀到他们家中做客，享用李好亲手做的手抓饭，逗一逗他们可爱的儿子。因为认识了这位帅翻译，我会特别留意塔吉克斯坦的各种消息。我时常看穆志龙出现在各种重大国事活动中。《新闻联播》里有他的身影，上海经合组织会议的翻译席上有他的名字。2018年6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来我家坐坐》系列报道还为他做了一期专访。2019年9月，他还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学生塔吉克语。今年疫情期间，他还陪同14位陕西专家到塔吉克斯坦支援。在塔期间，中国专家通过视频连线、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塔方的疫情防控情况，讲解、交流中国的抗疫经验。**语言互通，才能民心相通。这些交流的背后，有我这位帅翻译的一分功劳。我为我的外国朋友穆志龙骄傲，希望以后可以有新的合作，希望和他一起推进中塔友谊万古长青。**